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转型的路径选择及其特色

王晓芸

(中共上海市徐汇区委党校,上海 200233)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变和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为了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和更新政党外交的思维、理念和运作方式,从支持“以苏联为首”到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则更新,从无产阶级政党到世界各国各类政党的对象扩展,从注重意识形态到关注国家利益的重心位移,从促进国家间关系到推动全球治理的内涵扩充等等,完成了一次全面而深刻的转型过程。正是这一转型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延续性、开放性、多元性、学习性等鲜明的中国特色,拓展了政党外交的发展空间,增强了政党外交的发展动力,指明了政党外交发展的方向,使其在世界政党外交格局中独树一帜。

[关键词]政党外交;中国共产党;路径选择;特色

[中图分类号] D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2)07-0026-04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各类政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致力于开创政党外交的新格局。毫无疑问,与改革开放前30年相比,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无论在思想理念上还是实践方式上都已发生了深刻的转型。正是在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政党外交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强化了自身独特的优势,成为中国特色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家的总体外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和功能。

一、政党外交转型的客观依据

新中国建国以来,作为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挥党的对外交往和联系的功能,政党外交曾经对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变和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政党外交日益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政党外交的转型也势在必行。

第一,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淡化。在两极对抗的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因素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意识形态不仅决定着政党外交的对象和内容,而且也影响着政党外交的实践方式。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

与发展的转换以及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开始下降,超越意识形态处理国家间关系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常态。与此相伴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深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不仅促进了世界生产、金融、贸易等领域的一体化,而且也促进了世界性普遍交往和国家间相互依存。对于民族国家而言,要有效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发展民族经济就必须尽可能避免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此外,经济全球化所衍生的诸如环境污染、恐怖主义、能源危机、毒品泛滥等大量全球性问题,也使得强化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而要有效开展全球治理,同样需要世界各国在搁置甚至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何况,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政党普遍淡化意识形态,无论是西方国家政党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党,都突破了只同意意识形态相近或相似的政党建立外交关系的框框,与在政治光谱中处于不同位置的各类政党进行接触和交往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总之,时代主题的变化、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世界政党外交发展的大趋势,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提出了新课题,即走出意识形态阴影,推动政党外交的转型,让政党外交在新形势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第二,中国和平发展的现实需求。自1978年改

[收稿日期]2012-04-30

[作者简介]王晓芸(1970-),女,上海人,中共上海市徐汇区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谋求国家崛起的和平发展道路。这一道路的选择也对我国政党外交的转型提出了新要求。其一,政党外交的思维视角应从阶级转向国家,即从重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转向尊重各自国家利益。与此相应的是,在处理不同国家政党关系时也应切实尊重各国政党的独立、平等地位,以便减少国家间关系发展的障碍,通过与世界各国政党之间构建新型的政党关系,创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其二,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国际上误解或曲解中国和平发展的各种论调如“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反复出现,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而且也恶化了中国崛起的国际舆论环境。这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从交往目标、交往对象、交往内容、交往模式等不同层面对政党外交进行审视和调整,以便充分发掘政党外交的独特优势,发挥政府外交所不具备的特殊功能,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和平发展的坚定决心,缓解来自外部的压力。其三,随着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如何调整和完善政党外交的角色、机制,使之与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相适应、相协调,进而向国际社会展示和塑造中国共产党负责任大国、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是新时期中国政党外交必须面对和承担的新任务。

第三,中国共产党面临自身建设的新课题。对于一个拥有八十多年历史、拥有七千多万党员、领导着十几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而言,如何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国内外形势变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保持长期执政的地位,是其在相当长时间内所面临的一项现实而严峻的课题。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仅要立足国内,致力于解决代表国内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课题,而且要改变过去一味关注国内事务、不太关注和研究国外政党的传统做法,进一步增强党的世界眼光和对外学习和借鉴的意识,善于利用政党对外交往这一了解世界、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渠道和窗口,从世界各国政党的兴衰成败中汲取经验和启示。

二、政党外交转型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政党外交 30 多年的发展进程,也是不断调整和转型的过程。尽管这一转型涉及到政党外交的几乎所有方面,所产生的振动和影响也并不均衡,但总体上看,这一转型是通过

多条路径实现的。

第一,原则更新:从支持“以苏联为首”到强调独立自主。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获取苏联的支持,捍卫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中国共产党一度支持建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曾对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说“要不要以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客观而言,这一主张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对于争取苏联的支持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上世纪 60 年代后,苏联以大党、大国自居,对中苏关系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也带来了十分负面的影响。进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其他国家政党关系时突出强调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为此,1982 年党的十二大确立了新时期处理党际关系的四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所谓“独立自主”是指所有政党都有自主地处理本党内的一切事务和决定自己对国际事务立场和主张的权利,都有独立自主地判断和处理党际关系中的是非曲直的权利。这就要求各国政党无论大小、执政与否、意识形态是否相同,都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不能以“老子党”、“父子党”、“老大哥”等自居,反对在党际交往中搞大党主义;各国政党之间应该相互尊重,既彼此尊重对方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的权利,也尊重各国政党根据本国国情制定内外政策的权利。依据上述精神,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对外交往中,无论大党、小党还是老党、新党,无论当权与否,中国共产党都一律以诚相待、平等相处,从不干涉别国政党的内部事务。

第二,对象扩展:从无产阶级政党到全世界各国各类政党。上世纪 50 年代初中联部成立时,中央将“了解、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情况,为中央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信息和建议”^[1]作为党开展政党外交的基本定位。在此后的冷战岁月里,为适应严峻的国际斗争大环境、服务于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党将政党外交定位在开展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接触和交往,以便协助和支持我国政府做好对这类国家的关系。尽管我们党也重视与第三世界国家乃至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建立联系和发展关系,但却谨慎对待甚至回避与我们党有意识形态差异的西方国家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发展关系。进入新时期,随着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我们党也开始逐步改变过去主要限于同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政党交往的做法,将政党外交的对象拓

展为世界各国各类政党和政党间国际组织。交往的对象既有越南、朝鲜、古巴、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也有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或在野党;既有发展中国家的各类民族主义政党,也有前苏联、东欧地区转型国家的主要政党。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与政治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交往及联系,基本覆盖了世界上所有类型的国家。政党外交已经改变了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相对封闭的传统格局,形成了一个以各国主流政党和国际组织为主要对象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外交新格局。

第三,重心位移:从注重意识形态到关注国家利益。如前所述,在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常以意识形态为依据开展政党外交。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对政党间关系起着引导、支撑和固化的作用。一旦意识形态上产生争议,政党间关系甚至国家间关系便会遭受严重的冲击。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政党外交时日益重视以国家利益代替意识形态,将创造有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确立为包括政党外交在内的我国总体外交的首要任务。为此,我们党的政党外交牢牢立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开展各项工作,不断丰富政党外交中的经济、文化、科技含量,坚持政党交往与经济建设、政党交往与文化交流、政党交往与科技交流等因素相结合,努力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提供支持。具体做法包括:配合政府开展对外关系,促进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周边国家关系的稳定发展;开辟出“政党外交搭台、经贸活动唱戏”的新途径、新形式,加强经济交流,促进与世界各国间经贸合作;注重学习世界各国政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在治党治国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国内有关部门牵线搭桥,为国家经济建设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有针对性地安排考察其他国家经济建设项目,深入探讨研究不同国家的发展战略,把有实力的企业和项目推向国外;在全球面临金融危机时,与各国政党的领袖、政治家进行广泛接触,交换对金融危机的看法,共商合作大计、共谋发展之策等等。

第四,内涵扩充:从促进国家间关系到推动全球治理。长期以来,配合和协助政府外交、促进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是我们党开展政党外交的重要考量。尽管在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也一度重视在对外关系中展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加大对其他社

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援助的力度,但其着眼点还是在于促进中国与上述国家间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步重视在与各国政党交往过程中探讨和协商治理全球性问题的有效思路和途径。为此,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国际关注民主化、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奉行互利共赢的原则,不断扩大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的正当关切。近年来,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致力于推动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这一理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外交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我国政党外交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和发展动力。

第五,目标增多:从单纯服务于政府外交到把政党自身建设纳入政党外交目标之中。世纪之交,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丧失政权,不能不引起同为世界大党、老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警觉和思考。研究世界各国各类国家的主要政党在自身建设、治国理政方面的共同挑战和经验教训,理应成为新时期我国政党外交的重要任务。面对世界各国政党在全球化时代的兴衰起伏,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强调政党外交服务政府外交的同时,日益自觉地将加强政党自身建设纳入政党外交的视野,把政党外交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紧密联系起来。为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十分重视总结外国各类执政党先进的执政理念和方式,学习借鉴各国各类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的做法,同时重视研究苏联和东欧等国家政党衰亡的深刻教训,总结其中的深层动因,努力为加强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改进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第六,定位调整。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存在交叉和重叠的现象,这虽然有利于有效贯彻国家外交的总体战略,但对发挥政党外交的独特优势有时会产生一定的制约。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党外交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日益重视处理好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之间的关系,虽然将自身定位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具体事务,而是注重发挥自身不过分拘于礼节、交往形式比较灵活等特有的优势,以弥补政府外交的不足。既不让政党外交代替政府外交,又不因为政党之间的意见分歧或矛盾而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

三、政党外交的中国特色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和转型,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不仅实现了一次全方位的更新,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形成了与世界其他国家政党外交不同的中国特色。

第一,延续性。所谓延续性是指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在制度保障方面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理论上讲,政党外交的主体是各国的执政党,非执政党开展的对外交流不能看成是政党外交,只能算是政党之间的对外联络和国际交流,只有执政党开展的对外交流才具有外交的意义。西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大多选择的是多党或两党竞争制度,政党的轮替是政治发展的常态。由于不可能在政坛上长期连续执政,其政党外交无论目标设定、资源配置还是运作机制上都难以保障延续性。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则具有长期执政的优势,其政党外交的运作机制则可以保持长期的延续性。

第二,开放性。众所周知,政党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组织,政党的政治活动不可能不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从世界范围内看,各国政党国际间交往主要在“同族”(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政治渊源)、或“同系”(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意识形态)范围内开展。比如西方国家的社会党、自由党或保守党大多就重视与自己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宗教背景的政党开展交流。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以开放的姿态,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致力于谋求与各国政党间相互了解与合作,这在世界各国政党的对外交往中并不多见。此外,鉴于在当今世界政党格局中共产党是少数党,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是少数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从其意识形态偏见和国家私利出发,经常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进行诋毁和攻击,给后者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和很大压力。鉴于此,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相对封闭的心态,以开放的心胸面向世界,不断加强对外宣传和沟通的力度,努力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尤其是对我国发展道路、政党制度、执政理念的了解和理解,主动向国际社会展示和树立中国共产党民主、进步、开放、自信、创新的良好国际形象。

第三,多元性。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它们开展对外交往的主要目标往往具有单一性,即基本上都聚焦在国家层面,把促进国家间关系、谋求国家利益作为最主要的考量。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的目标设定则具有多元性,即不仅关注国家利益,而且也关注公民个

体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交流不断扩大,我国公民出境求学、务工、经商、投资、旅游的人数逐年增多,在发展机遇空前增加的同时,中国海外公民的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由于中国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庞大海外公民群体,如何维护这些海外公民的安全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独有的“特殊”任务。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政党外交日益重视体现“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把“外交为民”上升为开展对外交往的基础性理念,不断加强为我国公民利益服务的意识,工作的着力点也日益向保障我国海外公民的基本权益转移,试图借助政党外交的渠道,利用自身方便、灵活、人脉广泛的优势,协助中国政府及时为海外人员排忧解难,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正是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已经从单纯的“外交为国”发展到“外交为民”的新阶段。^[2]

第四,学习性。从本质上看,西方国家政党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只是国内政治选举的机器,它们开展政党外交的一个重要意图是为争取国内选民的支持,积累政治资本。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在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的同时,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虚怀若谷的心态,注重学习各国各类政党在解决类似问题的对策思路,借鉴它们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的经验做法,为完善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供借鉴,以便加强政党自身建设,使得党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状态,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为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智力支持。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在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和更新政党外交的思维、理念和运作方式,完成了一次全面而深刻的转型过程。正是这一转型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使其在世界政党外交格局中独树一帜。更重要的是,此次转型大大拓展了政党外交的发展空间,增强了政党外交的发展动力,指明了政党外交发展的方向,这无疑将对中国的总体外交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家瑞.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J].当代世界,2008,(12).

[2]余丽.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实践之路与理念创新[J].中州学刊,2010,(2).

责任编辑 查昆岩